

● 环球随笔

“另一个世界”和经济学家

——参加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印度)随感

李成贵

2004年春节前,应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的邀请,我们一行前往印度孟买参加第四次“世界社会论坛”。这个论坛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和草根阶层的舞台,是多元文化交汇的场所。想象一下,130多个国家,2300多个非政府组织,230多个会场,75000多人,这样的一次会议带给人们的是多大的冲击和震撼!这次论坛的主题一如既往地仍然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那么,另外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也许泰戈尔在一首诗里已经提供了答案,他说:“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的。”而75000人的具体诠释是,这个世界是一个让人更自在更放松的世界,一个给贫者自尊弱者自信的世界,一个致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和治理结构的多元、协力、负责的世界。当风景如画的达沃斯那边,权贵们在程式化的官方话语中刻意地显示贵族精神时,在孟买污浊的空气笼罩下,临时搭建起的简易大棚中,75000人宣讲的是本土化和多样化的真实世界,他们没有一个人打领带,然而他们是精神贵族。他们聚集在一起,目的就是要反对文化殖民和经济至上,反对主流意识和主流形态上的强者对人类秩序的肆意破坏。记得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曾说,在所有人得到自由之前,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自由的。世界社会论坛所追求的就是这样让每个人都有自由的世界。

我曾多次赴欧美参加会议,许多记忆中的场景已经开始模糊。而此次世界社会论坛留给我的记忆将是终身难忘的。论坛上的热闹和激情也已经凝固为一种对人类世界及其未来命运的思考,影响到我的思想建构,是真正的收益匪浅。

由于专业的特点,论坛的主题——“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很容易使我想到阿马蒂亚·森这位1998年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这次应邀回到祖国,亲自参加了世界社会论坛,并作了发言。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桑蒂克尼坦,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阿马蒂亚竟然是泰戈尔给起的。森的外祖父是泰戈尔的秘书,在森出生时,外祖父请泰戈尔为女儿的新生儿起个名字。当时,泰戈尔欣然答应,为他挑了Amartya,意思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并说“这是一个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

森果真成了杰出的人。他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并在当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虽长期居住于英美两国,但从未放弃他的印度国籍。因此,他成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建校六百五十余年以来第一位非英籍院长,美国经济学会第一位非美国公民的会长,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

更重要的是,森的经济学研究不仅是规范的,而且充满了伦理关怀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诺贝尔奖评委会在评价森的成就时说,他把伦理的视角重新纳入到了基本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森出生于典型的书香世家,他在自传里说自己出生在大学校园,而且似乎一辈子都居住在校园里。森在思想上深受泰戈尔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他不仅像泰戈尔在给朋友的一封信所说的那样,把所有人的所有快乐看成是自己的快乐,而且把所有人的所有痛苦看成是自己的痛苦。他一直深切地关注着社会底层人民的疾苦,贫穷、饥荒和权力被剥夺,这成了他所有研究的核心(Core Theme)。

森在自传里提到,在他少年时,有一次看到一个名叫卡塔尔的穆斯林劳工在印度教区被几个暴徒用刀子捅伤了背部,这个血流

如注的男子痛苦地尖叫着,森的父亲把他送到了医院,森当时就跟在后面。卡塔尔告诉森的父亲,他的妻子多次告诫他不要进入敌意的印度教社区,但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他又不得不去,因为他的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卡塔尔后来还是死在医院。这件事给森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使他突然意识到狭隘的文化认同和经济上的不自由带给人的只有绝望。

他还提到,在他10岁时,班加尔(Bengal)发生了导致二三十万人死亡的饥荒。他感到震撼的,是那些饿殍和遗尸的阶层结构(“thoroughly class-dependent character”),森说,“在整个饥荒中,我的学校里、朋友和亲戚中间几乎没有人受到影响;饥荒甚至与中低阶层也没有关系——只有那些属于经济上最低阶层的人才是受害者,如农村的无土地者。”这次饥荒令森至今记忆犹新(“still quite fresh in my mind”),当他应邀回到祖国出现在世界社会论坛上时,他再一次提起了这段历史。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饥荒,导致低层人民的不幸?这是森一直苦心探讨的问题,也是他一生中最突出的问题意识。他在最重要的著作《贫穷和饥荒》中告诉我们,原因不在于总量的不足,而是因为分配的不公,是因为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所以,他主张要给每个人以“实质的(substantive)自由”,在他看来,发展就是要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这也正是世界社会论坛的核心理念。

森对社会底层人民以及道德的关切,使他获得了“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的美誉。他还帮助设计了联合国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以及用于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期望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标准以及其他指标,以全面反映人们的生活福利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样评价森:“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

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造成革命性的变化。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

森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和德性集于一身的经济学家，他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位经济学家生命价值和至纯品行。他也让我们不得地联想到我国经济学界的浮躁和混乱，想到我国很多经济学家的失语、失范和失态，其中有些甚至是人格的缺失。

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需要做到的是一不被权力征服，二不被金钱征服，而只服从于科学真理和道德原则。然而，我国的不少经济学家面对外界的喧哗、浮躁和诱惑，已经失去了从容和冷静，在“一和政治家接轨，二和企业家接轨”的趋势媚俗中，把学问变成了权力和金钱的婢女，为了峨冠博带而亵渎科学的尊严，甚至为了一点赏赐而将人格出卖。

以中国的现状而言，政府决策的机制已有了很大进步，经济学家似乎恰逢其时有了更多的话语机会。但是，经济学家的重任在于解释世界，需要的是就其所谙熟的问题做出发言，需要的是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思考，而不是靠占据了要害位置，贩卖一些毫无学术品位的“太仓之粟”。这些人的危险性在于，第一拿不出政府所需要的货真价实的东西，第二不仅他们本人的学问会退步，而且给整个经济学的进步罩上了厚茧。

经济学家为企业谋划发展，用真正的学问换回货币，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鼓励。但如果蜕变为企业的代言人，为了一己私利而指鹿为马，那么，在浓浓的商业气息的桑拿浴中蒸发掉的，恰是他们的灵魂。不久前《瞭望东方周刊》暴出了经济学家与资本的联姻，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经济学家在幕后的舞台上是如何性情摇荡，心满意足地为资本献身！当然，我们不否认其中一些人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品性上也不是唯利是图的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暗地里与资本媾和，生出来的只能是丑陋的怪胎。

对于这些角逐于名利场上的所谓大家名流，我们已经不屑与他们较量才智与德行。

然而，有人愿意较量一番。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非主流对主流讨伐。这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另一景观。非主流者，大抵具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和对现实苦痛的敏感，他们的忧患意识在这个时代也属于稀缺品，但是，很多时候，当他们立意就是要反抗，像莽汉一样摆开骂人的架势时，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勇气和批判欲望远远多于理性和科学态度。知识分子不能没有批判精神，但是如果在“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意志”的背后只剩下鲁莽、偏执和勇气的话，那么，他们就连起码的知识分子都算不上。我们同样不屑与他们共用“经济学家”这个称号。

我们需要另外的一个世界，也需要另外一种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过一种从容宁静优雅的精神生活，并把科学与人类的智慧和情性凝结到一起，肩负起力所能及的道义和责任，像森一样。

